

波动之后的全球化新进程与全球治理的新议题〔*〕

——区块链、人的流动与权威的跨国耦合

○ 杨 昊

(中国政法大学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 北京 100088)

〔摘 要〕在当前全球治理研究中,受到国际政治现实变化的影响,国家主义的回潮成为热点议题,但是,当研究重点转向“国家的回归”的时候,对阶段性情势转变的关注有可能使研究者忽略全球化固有的客观发展进程。这种固有的发展进程蕴含着新的议题,并将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在技术、社会和公共权威三个场域中正在萌芽的全球化新进程以及全球治理的潜在新议题,预示着“治理”复兴的可能,并将对这种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在阶段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回潮之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将面对重新拾起治理这一工具,以应对新的挑战的任务。

〔关键词〕全球治理;区块链;人的流动;权威跨国耦合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4.014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以及由叙利亚内战引爆的难民危机,也在事实上验证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失败与不足。从现实政治看,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其倡导的保守主义政策表现出了强大的政治号召力,从学术研究上看,“国家的回归”一时成为研究热潮。国家主义的回潮不仅体现在传统国家间权力政治研究的复兴,同样体现在当前全球治理研究中,这种研究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即全球化波动引发了世界形势的紧张,国际格局权力分配的变化带来了国家间权力政治博弈的激化。

作者简介:杨昊,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博士、讲师。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青年项目“中国边疆治理的全球维度”(项目编号:17ZFG81001)的阶段成果。

但是,当研究重点转向“国家的回归”的同时,对阶段性情势转变的关注有可能使研究者忽略全球化固有的客观发展进程。这种固有的发展进程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以及政治国家领域,萌芽出新的发展趋势,蕴含着新的议题,并将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一旦当前的全球化波动结束后立刻会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理论研究的彻底性要求研究者在对阶段性实践保持关注的同时,着眼于对全球化整体进程的前瞻性。本文旨在全球化进程并未受到根本逆转的前提下,着重对技术、社会网络和公共权威三个场域中蕴含的全球化的新趋势进行探微,并为相应的治理提供初步建议。

一、区块链技术与全球治理

2008年,化名为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匿名者在互联网上发布《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白皮书,提出了一种通过点对点(peer-to-peer)技术实现的去中心化的电子现金系统。比特币的发行不依靠某个特定货币发行机构,而是以计算机的算力为基础,作为计算机消费的工作量的报酬被发放。在交易过程中,通过密码学技术保障交易的安全性,这就使得交易过程可以摆脱传统交易所必须依赖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信任和担保,从而实现真正的点对点和去中心化。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引发市场的投机热潮,其市值已接近1400亿美元。^[1]在比特币引起的投机热潮和市场热度背后,作为其底层设计和基础架构的区块链技术,因其具备的开放和透明性、安全性、自治性,以及去中心化特征受到重视,并被视作一种潜在的治理工具。

区块链本身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中产生的交易会被记录在一个区块之中,交易通过非对称加密技术进行保密。当该笔交易发生之后,会以随机散列形式被广播到网络中的所有节点,网络中的节点将交易纳入一个新区块之中,并依靠计算机算力解答散列密码,首先破解的节点将会获得记账权(即工作量证明机制,Proof of Work, PoW),并将该信息再次向全网广播,在获得其他节点的认可后,该区块将会依据时间戳(timestamp)链接在上一区块后,并在该区块后制造新的区块,从而形成一个链条。通过上述工作机制,区块链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是开放和透明性。除交易双方的私人信息被加密外,交易数据和信息向系统内的所有节点公开广播,并可以通过时间戳加以验证,一旦信息确认,交易将被永久记录在区块链上,从而使得整个系统保持高度开放性和透明性。当然,根据开放性的不同,区块链可以划分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人链,但这种开放性的边界是由网络系统的边界所界定,而非社群的边界所界定,这就意味着区块链的开放性潜含着跨国性和全球性。

其次是安全性。交易双方的私人信息通过非对称加密技术进行保障,此外,由于交易信息是向全网进行广播,因此如果有某个恶意攻击者篡改自身节点的交易数据,对整个系统不会造成影响。通过时间戳,使得篡改数据变得可以被轻易识别,从而避免双重支付(double-spending)问题。只要系统中的诚实节点

的数量大于恶意篡改者节点的数量,系统将会默认拥有更多相同数据信息的节点版本才是真实信息版本,从而舍弃被篡改的区块。当然,这种设计也隐含着一种危险性,即恶意篡改者如果可以控制全部算力的 51%,通过发动共识攻击篡改记录,将会扭转区块链的发展趋势。

再次是自治性。区块链的自治性的基础在于对信任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信任是决定集体目标能否达成的一项重要公共物品,特别在分布式系统中,由于缺少信任,通常会引起拜占庭将军问题,^[2]而传统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依靠能够提供信任来源的公共权威、中间机构,或者社会网络等的协助,以实现集体目标。区块链技术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无需信任的条件下达成集体目标的可能。实际上,这种去信任并不是完全抛弃信任,而是将信任的来源由传统的权威、机构和社会资源转向以算法为代表的一套规范协议,从而使得在分布式安排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集体目标,这样就使自治成为可能。

最后是去中心化。作为一种分布式的数据库,区块链不需要中心化的机构或硬件设施,各节点间在权利义务上处于平等地位,加之信任和安全问题通过密码学技术得到解决,因此实现了去中心化。

区块链技术具有的上述特征,很容易让研究者想到“治理”这一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区块链潜在的价值体现在提供一种技术手段,让治理更具可操作性、更具稳定性,而且这种技术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的共有安排,既是进步,同时又隐含着解放的可能。因此,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各种分布式自治组织(DAOs, 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分布式自治公司(DACs, Distributed Autonomous Corporations)、分布式自治社会(DASs, Distributed Autonomous Societies)在社会治理、商业运作以及全球治理中涌现出来。

当前学术界对区块链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首先,以技术决定论和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乐观观点。区块链技术最积极的推崇论者主要是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或技术乌托邦主义者(technological utopianism)。技术统治论可追溯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由哲人王管理国家的想法,历经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依靠专家管理国家以实现去政治化的思想,以及 20 世纪上半期在美国兴起的专家治国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统治论开始和互联网技术结合,希望借助互联网本身具备的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特质,实现一种技术乌托邦,从而摆脱以等级制权威为特征的国家政府的限制,以及对大企业的依赖。如 1988 年的《加密无政府主义者宣言》(The 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1993 年的《密码朋克宣言》(A Cypherpunk's Manifesto),但是这种愿景很快被互联网的现实发展击碎,一方面,大型私营机构掌握或垄断了互联网资源,同时掌握了使用者的各种数据,使后者的隐私安全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政府很快掌握了管理互联网的技术,正如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网络空间同样出现了等级制、中心化,以及各种排他性的边界。但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让技术

统治论者重新看到了实现一个技术乌托邦的可能,区块链技术推崇论者通常认为“代码即是法律”(code is law),^[3]即区块链可以通过加密技术和一套算法,取代传统上对权威强制力的依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在区块链之中,每一个个体本身即是合法性来源,通过运用智能合约,传统的官僚机构和中间机构在管理和执行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大大降低(如果不是消失的话)。在这种分布式自治社区中,个人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即可达成依靠传统等级机制和权威机构实现的目标,让一个共同体自动运转。^[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通常会和自由主义观点相结合,有学者认为“他们(加密货币)已经与保守自由主义的超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5]。经典的自由主义者将个人财产、言论自由、法律平等以及社区的自治等权利置于政府的权威之上,政府应安于“守夜人”的角色,从市场和社会中抽离出来。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给政府的权威和公共职能提供了替代选项,这种技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组合,成为对区块链技术推崇论者的重要思想支撑。特别是考虑到区块链开放性特征中包含的全球性,一种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治理,成为区块链技术推崇论的典型观点,“这种观念将跨国组织从以地理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管辖权的局限中,转变为一种真正的全球云”^[6]。

其次,质疑论者和批评论者。该种论者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持谨慎态度,并着力批判这种技术潜在的危险和乌托邦性质。这种批判包括对区块链技术的质疑,对国家政府等公共权威在治理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强调。玛塞拉·阿特佐里(Marcella Atzori)认为,区块链技术标榜的去中心化,实际上会导致一种中心化的结果,^[7]以比特币为例,工作证明机制意味着计算出新区块的节点将获得回报以及记账权,这就意味着节点会趋向于中心化,以增加获得报酬和记账权的机会,对于单个节点来说,加入一个更大的算力集合会成为一种理性选择。阿特佐里认为这种趋势实际上会造成区块链去中心化理想的破灭,转而成为一种新的中心化组织形式。并进而提出,区块链技术所设想的去中心化的自治社会,是一种原始的“前政治”状态,其中的个人是“非公民”的,就像政治哲学家设想的原始状态一样,当原子化的社会形态在面对不同网络中的利益冲突和对抗时,将会缺乏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如果不能出现公共权威以解决冲突、分配不公等问题,点对点网络将有可能沦为向某些私人力量集中的新的暴政。^[8]此外,区块链技术本身具有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表现在物质基础上,即以区块链技术为底层设计的分布式自治组织或分布式自治社会,依靠互联网的畅通,以及电力的持续供应,而上述基础条件的实现依赖于外部力量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脆弱性还表现在被新技术取代的可能上,比如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有可能会对计算机的算力带来革命性变化,强大的计算能力导致的算力分配的变化,51%攻击将变得更可能发生。

第三,马克思主义论者。在关于区块链技术对治理的意义的讨论中,除技术决定论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者与强调国家和社群重要作用的保守主义者的争论之

外,马克思主义论者构成了讨论中的另外一方。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多看到区块链技术对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潜在的巨大意义,同时又拒绝自由主义者的市场至上论和原子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乌托邦。侧重强调区块链技术的自治性、开放性,以及在公平分配上的潜在价值,并且认为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推动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萨拉·曼斯基(Sarah Manski)在2016年提出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共建全球联合体(co-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mmonwealth)的构想,全球联合体的概念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左翼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Michael Hardt)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后者尝试通过对共同性(common)的关注,探索实现“对财富开放使用、集体的民主决策以及自我管理”的治理形式,以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帝国治理形式。曼斯基强调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这种全球联合体的实现的意义,用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全球学研究方法,考察了智能合约和物联网相结合,在分享农业(FarmShare)、公平协作(Fair.Coop),以及比特国(Bitnation)三个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分布式自治社区的运转情况,并提出区块链有可能使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和后国家的民主联合体的承诺变为现实,^[9]特别是该技术在分配上的能力,有可能打破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从而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为动摇全球资本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变革提供技术基础。

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吸引力并不局限于为一种公平、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基础,有学者甚至认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货币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实践基础,这种劳动价值论赋予电子货币以劳动证书的性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计了一种劳动证书:“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10]与货币的区别是,劳动证书是劳动者劳动时间证明,而不是一种资本,不能在资本流通的过程中进行增殖。有学者认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加密数字货币,依靠计算机的算力产生,在运算过程中消耗电力能源,因此,可以以能量量化劳动量和工作量,并与其他社会价值结构联系起来,重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11]

无论学术界对于区块链技术在改变人类社会组织方式方面存在什么样的讨论,该技术本身具有的革命性价值已经让其在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除各种DAOs、DACs和DASs形式的社会治理实践,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外,^[12]区块链技术已经开始引起一些国家的注意,将其运用于国家治理的实践中。美国参众两院在2018年2月6日和2月14日分别举行两场听证会,^[13]讨论了对虚拟货币的监管问题,并提及区块链作为变革技术在商业和金融上的应用,特别是在2月14日众议院听证会上,提及该技术可被用于提升政府效率,并强调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以促进和资助区块链技术在医疗、国土安全和档案管理等公共领域中的应用。英国政府办公室于2016年1月由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马克·沃尔波特

(Mark Walport)牵头完成的报告——《分布式账本技术：超越区块链》，强调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实现完全透明的信息更新与共享，减少欺诈、腐败，降低错误率和用纸成本，提升效率，并重新定义政府与公民在数据共享、透明性和信任方面的关系。日本政府在2017年承认比特币为合法支付方式，并成立区块链协会(JBA)，同年经济产业省颁布《区块链系统评估方法》，以规范相关项目的监管活动，并在房地产登记、身份认证、银行结算等领域开展实践。中国政府虽然对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持有更谨慎的态度，但对区块链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并在政策上体现出前沿性和前瞻性，2016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同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中，区块链被视作战略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除中央外，各地政府也纷纷开展区块链项目的实践规划，多个省份甚至将其纳入本省“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中。

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开放性、去中心化以及自治性特征内含着全球性，正如各国政府将其运用于国家治理的实践之中，全球治理机制也在尝试着将该技术运用于全球治理的实践之中，这种运用不仅是技术上的革新，而且包含了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可能。2017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开展了名为“积木块”(building blocks)的援助方案，借助数字货币，对贫困家庭和难民进行援助。传统上的联合国援助，往往会陷入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贪腐行为的陷阱之中，而具有非中介性和去中心化特征的点对点的区块链技术得以让援助行动直接绕过这些与中间机构相伴随的陷阱，增加援助的效率和透明性。实际上，这种援助方式也被诸多跨国非政府组织所采用，用以追踪援助资金的流向，提高了援助的效率。这种创新行动启发联合国采用新技术以实现全球治理目标，包括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以及联合国发展小组(UNDG)等诸多机构，纷纷尝试将该技术运用在保护儿童权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保护等领域，以推动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14]

从既有的实践看，区块链对于全球治理来说，最直接的作用体现在提高治理效率、去除腐败、增加透明度上，但背后的深远意义在于，依靠技术而非权威或其他中间机构，为全球集体目标的实现提供融资手段、监督和执行机制。在全球事务中，这种中间阶段公共物品(intermediate public goods)供给者的角色传统上由国家政府扮演，点对点的网络设计实现了去中心化和非中介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削减了全球治理目标实现过程中国家政府的影响。从乐观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家的立场的转变对集体目标的影响降低，从而增加以集体福利为目标的机构的行动能力，巩固全球治理实现的基础。无论批评论者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前景抱持何种程度的质疑，相关实践已经展开，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种技术在全球治理层面的运用仅仅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

的延续,即仅意味着排除国家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和自由竞争主导这一技术,那既有的全球化危机,如分配不均、权力和财富向私有机构聚合的趋势将会加深。在运用区块链技术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其内含的分布性和自治性,去中心化和非中介化是为了保障民主和提高效率,而非放弃必需的监管措施,保障该技术是资源和权力平等分配、提高治理机制效率的工具,从而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革新,一方面有助于冲破国家主义回潮带来的保守主义的束缚,推动全球治理的实现,另一方面又避免现有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弊病。

二、人的流动与全球治理

人的流动是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有学者认为全球流动的本质就是人的流动。^[15] 如果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人类文明在世界各地得以发展,是源于公元前 150 万年至公元前 5 千年之间直立人和智人从东非大裂谷向世界各地的迁徙。最近的三四百年间,人类社会出现几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直接对今天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政治秩序、生活方式以及流行文化带来了重要影响,这些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从非洲到美洲和欧洲的奴隶贸易、从亚洲到美洲和欧洲的契约劳工、从欧洲到美洲和亚洲的殖民者,以及二战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等。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口不断迁徙流动的历史。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后,人的流动也开始加速,呈现出流动人口绝对数量上升、迁徙频次增加、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多元化、人口迁徙动力多样化等特征。据联合国统计显示,2017 年全世界移民人口达到 2 亿 5 千 8 百万,移民走廊遍布世界各主要地区,亚洲、欧洲、非洲都同时既是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区,也是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地。与传统上由南方向北方的人口迁徙不同的是,90 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增长最迅速的走廊,出现在亚洲内部和非洲内部。^[16]

传统上,目的地的劳动力缺口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口流动往往能够推动目的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直到今天,移民群体的年龄结构中,工作年龄人口(19—64 岁)达到移民总人口的 72%,而这一数字在世界总人口中仅为 58%,^[17] 流动人口的年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移民汇款带来的资金流动,成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的重要实现途径,2015 年,这一数字已经高达 4400 亿美元,^[18] 而同期净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援助总额仅为 1576 亿美元。^[19] 如果考虑到经非正式渠道而没有被统计在内的汇款,这一数字可能还会更高。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出,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流出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这种影响随着人口流动往返频次的增加而得以缓解。可以说,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增长,在促进全球发展上提供了正面的影响。但这种正面意义也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的凸显,开始引发社会矛盾,甚至成为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政策的重要引线。

一方面是移民融入问题,相较于第一代移民的主动选择,第二代和第三代移

民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成为流动人口家庭的成员,这种前提意味着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天然面对身份认知的难题。社会政策能否让这些移民后代融入当地社会,或是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将会对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政治观念带来直接影响。一项牛津大学的研究指出,在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等移民目的地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非欧洲裔移民经历了种族苦难。^[20] 这些苦难包括了种族歧视、社会资源匮乏、贫穷和失业等,在经济危机爆发后,这一群体的社会状况无疑更为严峻,被剥夺感更为强烈,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通常会趁机而入,成为这一群体寻找集体认同、对抗社会不公的极端手段。而激进的思潮以至政治行动,往往会招致另一种与其相对的激进的思潮和政治行动的回应,就像一个正反馈回路,宗教极端主义引发了发达国家内部极右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回应。当经济危机爆发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的激进主义思潮也开始激荡,“文明冲突”成为社会融入政策以及社会分配政策失败的通俗易懂的替代解释,并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肇因。

另一方面是难民问题,如果说移民问题引发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失败,难民问题及其引起的危机则反映了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失衡。主权原则在二战后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传统上,主权意味着对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具有最高权威性、排他性和绝对性的特征。而在冷战结束后,主权开始和责任相挂钩,如“负责任主权”“主权责任说”等,其中最有力影响的当属联合国确立的“保护的责任”规范。该规范强调主权权力应建立在履行保护国内人权的责任之上,当主权无法履行这一责任的时候,国际社会有义务对其进行援助和能力建设,以至干预。然而在现实中,当国家主权无法完全履行相应责任的时候,“保护的责任”往往会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外部力量带来的不是对于主权的帮助和能力建设,而是带有强权政治色彩的干预,从而造成新的人道主义危机,并蔓延到主权疆界之外。另一方面,当没有外部力量的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时候,国家权力和责任的失衡通常陷入泥沼之中,从而成为负面外部性的源头,并将无法履行的主权责任转嫁给其他主权国家,造成主权权力与主权责任之间的失衡。前者鲜明地表现在利比亚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泛滥的问题,后者则鲜明地表现在叙利亚内战以及由此带来的难民危机问题。据联合国统计,仅2015年,叙利亚内战就制造了490万难民,^[21] 大量难民涌入欧洲等地,当叙利亚无法履行国家责任的时候,这种责任通过人口的流动转嫁到其他国家,从而引发难民危机,这种危机与移民融入问题纠缠在一起,催生了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兴起,进而危及开放的全球秩序。

由于人的流动引发的问题,是社会融合政策和全球治理机制失效的结果,但却在极端情绪的助推下退化为反全球化政策的典型实践领域。在最近一两年间,国际社会见证了全球人口流动政策的收缩,在美国,这种收缩和退化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中达到顶点,如宣布暂停叙利亚和其他六个国家的难民入境,^[22] 废除“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退出《难民与移民纽约宣言》

进程等。在欧洲,东欧诸国关闭边境且拒绝接受欧盟难民分配方案,其他传统移民国家也对人口流动加强管制。

各国政策的收紧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限制人口流动的数量和规模,但如果没有消除背后的社会政策弊病和全球治理机制失衡,这些政策从长期来看只会成为潜在的更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催化剂。实际上,强制遣返不仅人为地在制造人口流动,这些被迫流动的人口也会随时准备着再次迁徙,而拒绝难民或移民入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口流动的动因,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移民流向。特别随着发展不平衡从南北之间向地区内部之间转移,人口流动的通道也开始变得多元化,当传统通道遭到封堵后,新兴通道的人口流量有望增加。

人口流动背后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人类流动方式的进步,这种趋势不会因为收缩性的政策而得到转变,这种政策毋宁说是压抑了当下需求,从而激发了更多潜在的人口流动。这种潜在趋势给全球治理带来的积极意义在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有可能在全球更广泛的范围内出现,当然,这种趋势也意味着不当的社会政策,错位的全球治理机制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内的“文明冲突”,特别是对于那些潜在的新兴人口流动目的地国来说,能否做好相应政策准备,趋利避害,将决定未来的人口流动是会重复既有的歧路,还是开创出崭新局面,而这种崭新的局面,不仅具有国家治理层面的意义,反过来同样具有全球治理层面的意义。^[23]

三、权威的跨国耦合与全球治理

此处的权威的跨国耦合,并不是传统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国家间的结盟行动,也不是跨国范式强调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而是指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国的公共权威总是在全球公共政策的网络之中做出选择,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权威的政策选择都会在全球公共政策网络上被标示、被界定,从而成为某个公共政策联盟上的成员,被联接到某个阵营之内。^[24]这个阵营会包括政府、市场力量和社会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权威会主动寻求政策上的跨国联盟,并且发现这种跨国联盟是可以被寻找到的。而如果某个国家一意孤行,用极端保守主义的立场施行各种政策,将会发现反对他的跨国联盟将会形成,这种联盟(或称统一战线)将会蔓延在其领土疆界之上。这种情况让那些回到几个世纪之前的国家中心主义时代的想法显得代价高昂,并且不切实际。换句话说,国际社会当下发生的作为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代表的、对全球秩序形成威胁的国家中心主义政策,背后实际上是全球公共政策中的一种极端政策立场,围绕不同政策立场展开的种种争论又成为权威跨国耦合的动力。如果权威希望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那就会寻求治理的帮助,而非将治理抛开。

一方面,能够主动寻求这种跨国耦合的公共权威,将会发现自身的政策可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全球公共政策网络中寻找到有共同立场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将让特定权威的政策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传播。比如,在实现全球化再平衡的

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这种联结,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积极做法可以看作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新时期的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各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的政治联盟,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一战线历来包括国内的统一战线和国际的统一战线,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潮流涌动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构建推动全球化和开放贸易的“统一战线”,强调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应对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减少全球化阻力。包括与金砖国家取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识,形成国家间的政策耦合;召开世界政党大会,与120多个国家的200个政党就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共同风险和挑战,结成政党间的跨国耦合;通过建设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举措加强与国际机构在可持续发展和维和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耦合。

另一方面,那些拒斥在全球公共政策网络中寻求这种政策耦合的权威,将会发现自身不可避免地被该网络所标记,并遭到跨国网络的反对。比如,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保守主义政策将美国政府置于一个拥护气候变化协定的网络的对立面,而这一网络蔓延到美国内部,包括其他国家、美国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公民社会在内的跨国网络被特朗普的政策推向另外一个共同的阵营。当然,即使极端保守主义者也会发现自身的政策具有潜在的跨国联结性,并寻求对这种耦合的确认。^[25]

这种权威的跨国耦合,很容易让人想到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情况,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世界上出现了不同的跨国联合,但今天与历史不同的是,全球化的大背景让世界各处的人们处于多种议题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网络之中,耦合也不再是界限分明的“阵营”和全方位的敌我区分,而是围绕议题展开的,不同全球公共政策立场的联结,这让那些即使奉行极端保守主义立场的决策者也潜在的可以被包容进网络之中。这种发展趋势的重要意义是,全球公共政策的调整和讨论,是解决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表象背后的密钥所在,而这种调整和讨论,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务和功能之一。

注释:

[1]据加密货币市值网站数据显示,比特币市值在本文写作时达到1386亿美元, <https://coinmarketcap.com/>。

[2]拜占庭将军问题(Byzantine Failures),拜占庭将军问题是一个协议问题,假设拜占庭帝国军队的将军们必须全体一致地决定是否攻击某一支敌军。问题是这些将军在地理上是分隔开来的,并且将军中存在叛徒。叛徒可以任意行动以达到以下目标:欺骗某些将军采取进攻行动;促成一个不是所有将军都同意的决定,如当将军们不希望进攻时促成进攻行动;或者迷惑某些将军,使他们无法做出决定。如果叛徒达到了这些目的之一,则任何攻击行动的结果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完全达成一致的努力才能获得胜利。莱斯利·兰伯特(Leslie Lamport)用这一概念描述点对点通信中的基本问题,指在存在消息丢失的不可靠信道上试图通过消息传递的方式达到一致性是不可能的。

[3]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Basic Books, 1999.

[4]Vitalik Buterin, “A Next-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Ethereum White Paper, 2014, https://www.weusecoins.com/assets/pdf/library/Ethereum_white_paper-a_next_generation_smart_contract_and_decentralized_application_platform-vitalik-buterin.pdf.

[5] Brett Scott, *How Can Cryptocurrency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Play A Role in Building Social And Solidarity Finance?*, No.2016-1,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2016.

[6] Melanie Swan, *Blockchain: 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 O'Reilly Media, Inc., 2015, p.32.

[7][8] Marcella Atzori,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Is The State Still Necessary?",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6, No.1, 2016, pp.16, 24.

[9] Sarah Manski, "Building the Blockchain: The Co-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mmonwealth to Move Beyond the Crises of Global Capitalism", *12th Annual California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7th May 201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

[11] Steve Huckle and Martin White, "Socialism And The Blockchain", *Future Internet*, Vol.8, No.4, 2016, p.49.

[12] James Shneider et al, *Blockchain: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Goldman Sachs Equity Research Profiles in Innovation, 2016.

[13] 两场听证会主题分别为:“加密货币:美国证监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督作用”,美国参议院官方网站, <https://www.banking.senate.gov/public/index.cfm/hearings?ID=D8EC44B1-F141-4778-A042-584E0F3B9D39>, 以及“超越比特币:区块链技术新兴应用”,美国众议院官方网站, <http://docs.house.gov/Committee/Calendar/ByEvent.aspx?EventID=106862>。

[14] <https://un-blockchain.org/2017/04/24/>。

[15]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

[16][18]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201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ST/ESA/SER.A/403)*, pp.4, 29.

[17]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201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Highlights (ST/ESA/SER.A/404)*, p.17.

[19]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DT.ODA.ALLD.CD>。

[20] Anthony Heath and Sin Yi Cheung, "Ethnic Penalties in The Labour Market: Employers and Discrimination", *Crown Copyright*, 2006.

[21] UNHCR,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http://www.unhcr.org/en-us/statistics/unherstats/576408cd7/unhcr-global-trends-2015.html>;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http://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6/>。

[22] 2015年度和2016年度,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三方安置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为82500名和96900名难民进行第三方安置。

[23] 作为新兴的人口流动目的地国,中国近年来开始加强对人口流动问题的重视,并已经采取相关措施进行管理,2018年3月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拟设立移民管理局。

[24] 姚璐和刘雪莲借用计算机科学中的“耦合性”概念探讨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联系,并提出大国际秩序的三种耦合关系,即非直接性耦合、控制性耦合和公共性耦合。本文的跨国耦合,接近公共性耦合的概念,但这种耦合并非指向所有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利益,而是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划分的集体利益,更接近于“交叉耦合”(cross coupling)的概念。参见姚璐、刘雪莲:《中国与国际秩序的耦合性试析》,《国际观察》2016年第4期。

[25] 当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参加2018年3月10日在法国举行的右翼政党大会时,对欧洲右翼政党宣称“你们是全球运动的一部分”,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3/12/c_137033041.htm。

〔责任编辑:刘 臻〕